

女性叙事及生存斗争

——评“那不勒斯四部曲”

陈 英

内容提要 费兰特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意大利作家之一，她在2011至2014年间相继出版了“那不勒斯四部曲”，讲述了两位女性长达五十多年的友谊，在世界上掀起了“费兰特热”。“四部曲”深入挖掘了“女性友谊”这个文学主题，另一方面也通过女性的视角讲述了意大利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揭示了南方女性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生活状况：生存空间逼仄、遭遇暴力以及她们的抗争。本文主要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费兰特的叙事特点，以及她对二十世纪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 费兰特 女性主义 那不勒斯四部曲

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1943—）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意大利作家之一，2016年她被《时代》周刊列入“一百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意大利和世界各地也在纷纷举办关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研讨会，令她一跃成为当代意大利文学的领军人物。

“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的主要线索是两位那不勒斯女人——莉拉和埃莱娜的友谊，她们之间的关系比爱情更长久，比亲情更深刻，是一种非常规友情，用“友谊”来界定似乎太狭隘，这是一种销魂蚀骨、富有激情、混杂着爱与崇拜的关系。^①当代文学研究者蒂齐亚娜·德罗加蒂斯对费兰特的成功进行分析，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系列颠覆了人们对女性友谊的刻板观念——认为女性无法维持一种长期、稳定而深刻的关系”^②。

女性友谊毫无疑问是“四部曲”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费兰特把两位女性人物放置于那不勒斯一个混乱、暴力的城区，讲述了她们为生存进行的斗争，同时也展现了一个社会群体在几十年里的生活变迁，费兰特通过女性视角绘制了一幅恢弘的历史画卷。而本文主要侧重于探讨费兰特对于意大利女性写作传统的继承和突破，分析她对二十世纪后半叶女性主义运动的回顾和反思。

① 陈英《我的天才女友为什么人间蒸发》，载《北京青年报》2017年1月10日，B4版。

② Tiziana de Rogatis, *Elena Ferrante, Parole chiave*, Roma: Edizioni e/o, 2018, p.17.

一、费兰特与二十世纪女性写作传统

埃莱娜·费兰特早在1992年就活跃于意大利文坛，其作品主要反映当代女性的生活和困境，她的小说《烦人的爱》（*L'amore molesto*）曾被知名导演马里奥·马尔多内（Mario Martone）改编成电影，在意大利引起了很大反响。文学评论家朱里奥·费罗尼在分析费兰特作品的文章中提出：“[她的]作品里很容易看到艾尔莎·莫兰黛的影响，她以暴力、破败的那不勒斯为背景，揭示出各种让人痛苦的家庭矛盾。”^① 费兰特近二十年的创作其实也一直在深入挖掘这几个主题：那不勒斯社会、家庭关系和女性处境。

费兰特在访谈中多次提到她深受意大利女作家莫兰黛（Elsa Morante, 1912—1985）的影响，尤其是《谎言和占卜》（*Menzogna e Sortilegio*）对她影响很大，而且费兰特这个笔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脱胎于莫兰黛^②，但这个笔名背后的真人究竟是谁，至今仍然是一个谜^③。费兰特的“四部曲”在体量和风格上更靠近莫兰黛的另一部作品：长达六百六十一页的小说《历史》。不少评论家认为，《历史》反映了当时意大利文学的创作动向，是“从外界转到内心”“从现实升华到想象”的典范。^④ 莫兰黛的《历史》讲述了1941年到1947年期间发生的事：每年一章，每章都用小型字体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概述那年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展示该章小说情节的时代背景。这样的布局与结构使小说的故事情节与当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故事的内容既富于象征性又具有典型性。^⑤ 而费兰特的“四部曲”意大利语版总共一千六百二十八页，故事从战后六十年代开始讲起，涵盖了意大利绵延五十多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从二战后破败贫穷的社会状况到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再到1968年学生运动、红色旅、“沉重的年代”、新法西斯主义、绑架莫罗案、意大利工会斗争等等。这些大事件都巧妙地嵌入了小说故事情节之中，历史折射在人物的生活里。

费兰特的“四部曲”聚焦于生活在一个破败城区的几个家庭：鞋匠、门房、木匠以及点心师傅，还有黑社会和放高利贷者，囊括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成一个那不勒斯小社会。书中还重点刻画了木匠家庭出身的帕斯卡莱和新法西斯分子索拉拉之间

① Giulio Ferroni, *Letteratura italiana contemporanea 1945-2007*, Milano: Mondadori, 2007, p.300.

② 孙若茜《生长在那不勒斯的女性史诗——专访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载《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4期，第147页。

③ 费兰特在1992年出版第一部作品时就表示不会在公众场合露面，不会出面为作品做任何宣传。See Ferrante Elena, *La Frantumaglia*, Roma: Edizioni e/o, 2016, pp.11-12.

④ 艾尔莎·莫兰黛《历史》，万子美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封底。

⑤ 沈萼梅、刘锡荣《意大利当代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415页。

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整个社会斗争的缩影。除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费兰特其实更关注的是女性的声音和命运。她有意识地继承了女性写作的传统，并曾表示：“我从女性主义丰富、系统的思想里汲取了很多营养；女性主义思想改变了我，让我眼界大开。”^①“我从这些女性作家身上学到了很多：菲尔斯通、隆齐、伊里加蕾、穆拉洛、卡瓦雷罗、加利亚索、哈拉维、巴特勒和布雷多替都让我受益匪浅。”^②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性解放、避孕药的合法化、离婚权等也在埃莱娜和几个朋友的交谈中得到深入讨论。实际上，小说甚至直接引用了七十年代意大利女权主义者卡拉·隆齐的文章来展现当时运动的热潮，对“所有父权文化的体现，所有组织形式”表示抵制，“反对污蔑女性智慧，对女性的洗脑”。^③

新千年的意大利文学经历了一番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尝试后，似乎又在有意回归传统。“最近几年，随着文学批评导向和读者阅读趣味的转变，现实主义题材、历史题材和反思文学又逐渐成为意大利文学创作的主流，创作语言和手法也有回归传统的倾向。”^④也有中国批评家清楚看到“四部曲”的现实主义特点，称之为“老实得近乎笨拙的小说”^⑤。费兰特的写作手法比较朴素，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不明显，“四部曲”沿袭了意大利二十世纪现实主义写作传统，把历史事件和私人生活贯穿起来，比如把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巧妙地插入了故事之中，讲述了意大利女性获得各种基本权利的过程。

正如有学者所说，“现代文学有许多人为的变异或断裂，比如西方现代派的种种极端的做法……好在二十世纪末至今，现实主义的回归又恰恰证明刻意的、片面的求变求新并未将文学引向康庄大道，相反倒是喝住了不少读者”^⑥。费兰特的“四部曲”在四十八个国家拥有七百万读者^⑦，这种巨大的成功代表了某种风向和潮流，从接受角度彰显了她写作的突出价值，同时也是因为她把意大利女性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二、“那不勒斯四部曲”及女性为生存的斗争

费兰特在访谈中表露出明显的女权主义倾向，她在“那不勒斯四部曲”里塑造的

① 孙若茜《生长在那不勒斯的女性史诗——专访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第150页。

② Ferrante Elena, *La Frantumaglia*, p.323.

③ 埃莱娜·费兰特《离开的、留下的》，陈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270-271页。

④ 金莉、王丽亚《外国文学通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359-360页。

⑤ 黄昱宁《对故事和情感仍怀有信心》，载《文汇报》2017年10月15号，第11页。

⑥ 陈众议《文化自信与“二为方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刍议（三）》，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页。

⑦ Tiziana de Rogatis, *Elena Ferrante, Parole chiave*, p.13.

两个女性形象也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和自我意识，她们相互参照，彼此协助，一生都在为生存进行着殊死斗争。在“四部曲”中，女性随时处在被男性（无论是不让自己读书的父亲，还是暴力的丈夫，抑或是索要性贿赂的工厂老板）碾压的境地，女性在精疲力竭的边缘，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崩溃，避免自己的精神被碾压成碎片，只能通过写作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用文字固定住那些秘密，然后等待逃离。^①

小说中勇敢的反叛者——莉拉从小就经历城区和家庭的暴力，但她并没放弃自我，抗争一直伴随着她。莉拉从小就很有主见，但“对于蛮横不听话的女儿，父亲可以随意处罚”^②。为了争取上学的机会，她和父亲发生激烈的争吵，最后被父亲从窗子扔了出去，生生摔断了胳膊。莉拉结婚后，遭受暴力的处境依然在继续：“莉拉几乎一直站着，坐着身上会很疼。没有人提到她发肿发黑的右眼、破裂和下嘴唇以及淤青的胳膊，包括她一直沉默不语的母亲。”^③到了暮年，莉拉甚至通过彻底消失来表明她的决绝。

在那不勒斯社会文化中，这种暴力是肢体的、语言的、表象的，也是思想上的，甚至成为人们沟通的一种方式。大部分社会成员，包括莉拉的母亲似乎也默认了这种暴力的合理性。早在一百年前，伍尔夫提到那时出版的《英国史》记载：“殴打妻子是大家公认的男人的权利，而且不论上等人或下等人一律如此，而不以为耻……假如女儿拒绝和父母所选定的男人结婚，就会被关起来，被鞭挞，在屋子里被推得东跌西撞，而大家不以为奇。”^④女性遭受的这种暴力根深蒂固，暴力作为一种常态每日在那不勒斯的这个破败城区上演，整个城区要求女性绝对驯服于父亲和兄长，埃莱娜和莉拉从小到大的经历无不在说明：反叛在哪里出现，暴力就会在哪里出现。费兰特的控诉很沉痛，提醒女性保持一种警惕的态度和锐利的自省，捍卫自己的生存空间。

虽然故事中用了很多笔墨刻画两位女性人物遭遇的各种碾压，但作为叙事者“我”的埃莱娜没有丝毫的自怨自艾，也没有以受害者自居，而是运用所有力量和智慧进行抗争。从叙事学的角度，“叙事声音”是作品里讲述者的声音，“四部曲”里是老年的埃莱娜在回忆过去。这位成熟女性对于自己的整个人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她没有掩盖或者扭曲所遭受的各种撕裂和屈辱。为了在城区的艰难处境中生存下来，她和莉拉都采取了不同手段，这凸显了两个人物迥异的性格，甚至是她们的缺陷。很明显埃莱娜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我喜欢取悦于人，尤其是喜欢取悦老师”^⑤。在大

① 索马里《那不勒斯四部曲：镜子和自恋的暴政》，载《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7期，第77页。

② 埃莱娜·费兰特《我的天才女友》，陈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③ 埃莱娜·费兰特《新名字的故事》，陈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④ 维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⑤ 埃莱娜·费兰特《我的天才女友》，第28页。

学舞会上，埃莱娜认识了富家子弟马里，她虽然“没有办法爱上他”，却毅然和他在一起，因为“他给我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衣服、鞋子、新大衣还有眼镜框”^①。后来马里被学校开除，埃莱娜很快就改变了关注对象，这次是一个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前途无量的男生，她虽然无法爱上他，但“我越来越担心会失去彼得罗，我去找他，缠着他，我对他产生了感情，我一直都等着他给我表白”^②。而莉拉的“坏”也是“众所周知”，“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莉拉就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她很快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很坏”；“莉拉对我来说很耀眼，对于其他同学来说她只是很可怕。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莉拉是整个学校，甚至是整个城区最遭人恨的女生”；“她的每个动作都说明一个问题：伤害她是沒有用的，无论如何，她会变本加厉地还回来。”^③但这些描述丝毫没有掩盖她们的人性魅力，反倒让她们更加真实，迸发出一种难以抵挡的生命力，费兰特塑造的这两个女性形象和通常的“女性神话”截然不同，她们更逼真，更能引起女性读者的认同和共鸣。

在“四部曲”中，女性遭遇的暴力不仅仅是表象的、身体的，而且还有隐藏的。第二部《新名字的故事》中，埃莱娜成功摆脱了暴力的城区，作为社会下层出身的她，终于嫁入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过上了资产阶级生活。埃莱娜老年时回顾一生，由于心情低落产生了幻灭感，把自己的一生定义为“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④。她的社会地位的确得到了提升，但故事远远没有结束，她不得不承受婚后无聊、机械的性爱。她体会到：“婚姻和人们想的不一样，它就像一个机构，剥夺了性交的所有人性。”^⑤埃莱娜已经觉察到了婚姻作为体制对女性的盘剥和压榨，这种幻灭和醒悟为她后来实现救赎做好了铺垫。关于女性和婚姻，波伏娃在《第二性》里也有类似的表述：

婚姻原则是淫秽的，因为它把应该建立在自发冲动基础上的交换变成了权利和责任；它让身体注定在一般性中互相把握的同时，给予身体一种工具的、因而是可耻的性质；丈夫往往想要完成责任而变得冰冷，而妻子羞于感到自己被献给一个对她施行权利的人。^⑥

① 埃莱娜·费兰特《新名字的故事》，第339-400页。

② 埃莱娜·费兰特《新名字的故事》，第419页。

③ 埃莱娜·费兰特《我的天才女友》，第16，31，32页。

④ 埃莱娜·费兰特《失踪的孩子》，陈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454页。

⑤ 埃莱娜·费兰特《离开的、留下的》，第301页。

⑥ 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II》，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31页。

费兰特通过埃莱娜的婚姻体验把波伏娃提出的问题具体呈现出来，女人需要回归对自己的身体、时间的自由使用，而这又要经历一场殊死斗争。这场“贴身肉搏”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埃莱娜通过摧毁婚姻来实现对自我的掌控。“我和彼得罗婚姻破裂的事情，不仅仅把阿黛尔卷入其中，而且这个消息还传到了米兰，甚至是法国。我想这样最好，能让我们分得痛快点儿。我对自己说：该发生什么事儿就发生吧。”^① 埃莱娜经历婚姻的失败，她离开两个女儿去法国为她的女性主义著作做宣传：“我谈到了从小我在我母亲以及其他女人身上看到的家庭和生育最糟糕的一面，还有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我谈到了我从小就想掌握男性的思维方式。我感觉自己是男性捏造出来的女性，是他们通过想象构建的。”^② 很显然，埃莱娜的这场“贴身肉搏”也是以女性主义理论为武器。

因为这场离异，埃莱娜的母亲甚至对她拳脚相加，她还要遭受婆家的威胁——他们要收回之前给予她的一切。她抵挡整个社会的压力，选择彻底摆脱这个限制她发展、禁锢她自由的家庭，而情夫尼诺的出现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经过殊死的斗争后，埃莱娜终于能在都灵一所公寓里享受自己的空间和时光。她最终实现了救赎，夺回了身体和自我，但一切来之不易。她感叹说：“我吃了多少苦啊，经历了多少事情啊！每一步都好像要跌倒，但我都挺住了。我离开了城区，又回到那里，我又成功摆脱了。没有任何东西会把我和我生的几个女儿拉下水去，我们都得救了，我没有让她们任何一个沉沦下去。”^③ 费兰特指出的救赎之路，包含着对男性话语霸权的抵抗，积极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工作、社会身份和生存空间，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埃莱娜和小说家费兰特的思想重叠之处。

“四部曲”不仅是意大利女性写作传统的继承和延伸，也是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女性主义运动的回顾。在故事中，埃莱娜接触到了女权主义思想，这激起了她的崇拜和思考，让她获得了力量，写出了自己的著作，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主义者把‘声音’这个术语看成女性拥有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有了自己的声音，女性似乎在男权中心的社会权利关系中就占有了一席之地。”^④ 小说中，埃莱娜不仅写出了一本七十多页的女权主义著作，更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那不勒斯郊区工厂的工人争取权益。

① 埃莱娜·费兰特《失踪的孩子》，第15页。

② 埃莱娜·费兰特《失踪的孩子》，第37页。

③ 埃莱娜·费兰特《失踪的孩子》，第451页。

④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第XIV页。

波伏娃曾在《第二性II》中将妇女问题全盘列举出来,包括女性生活的每个阶段和方方面面:童年和少女时期的成长和教育,已婚女人的处境,母亲的身份,女性社会生活以及如何走向自由和独立。仔细阅读“那不勒斯四部曲”会发现费兰特用了一个一千多页的漫长故事,细致呈现了女性生活各个方面、各个阶段的问题。读者显然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一个故事,而不是纯粹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四部曲”通过两个女性的切身体验展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女性主义的思想成就,帮助女性了解自身处境,避免自我发展遭到各种传统习俗的禁锢和压抑。

结 语

女性问题是普世性问题,费兰特在世界上的译介也掀起了学者对于女性处境的讨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费拉德在1997年撰文呼吁构建一个女性主义时代,提倡译者搜集当代女性作品,并把它们介绍到自己的语言文化中。^①费兰特作品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正是这个女性主义时代的典型例证,“四部曲”一方面让读者了解到那不勒斯的风情,一方面也回顾了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几十年来的女性解放史,特别能引起女性读者的共鸣。费兰特的作品能给世界上很多女性,当然也包括处于城市化过程中处境艰难的中国女性带来力量和尊严。

回望过去,我们就会发现一部分女性正在享受的自由和权利其实并非由来已久,而是需要捍卫和斗争的成果。女性主义已成为一种全球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费兰特的作品在展示女性处境的同时,流露出一种鲜明的立场,具有强烈的启示性,展示出对暴力、压制的抗争姿态,启迪女性争取对自己身体和时间的自由使用,构建个人生活和发展空间。“太平之年,女性要获得独立自主,也需要一场场殊死搏斗。”^②费兰特在世界上的读者多为女性,这也是因为她们在费兰特的作品里找到了一种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工具。

*本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特色项目“意大利语专业特色教学团队”(8003182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意大利语系
责任编辑:王 涛

① 费拉德《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英文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前言。

② 陈英《历尽劫波后,女人们总是变得更强悍》,载《北京青年报》2018年6月26日,B1版。